

在拉萨与日喀则之间的大竹卡，旅伴赵修华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晕倒。徒步横穿西藏，这时候修华要是倒下去，我们徒步环中国旅行的计划就意味着提前破产。

我飞到武警交通支队帐篷求援，两名战士帮着我把修华抬进帐篷。当知道我们计划徒步后藏去新疆，医生神色凝重，劝说我们放弃这不切实际的计划，坦陈修华的这种高原疟疾很严重，如不及时休息、治疗，会要人命。

疟疾俗称“打摆子”，是由疟原虫经蚊虫叮咬而形成的传染性疾病。我免疫力强，不怕疟疾，可这里是修中尼公路的武警部队，我们不能把疾病传给部队战士。打完点滴，谢绝部队官兵的挽留，我们艰难地向日喀则走去。日喀则是医治和挽救修华唯一的地方。

1991年7月23日傍晚，我们走到日喀则市。在东郊，一个身材矮小，戴前进帽的汉族人端着半盆油条走进我们的视野。常年的野外徒步旅行，人们对我们的外貌认知扭曲。藏族人从行为举止，不认为我们是汉族人，而汉族人则从风吹雨淋过的黝黑面孔，误认我们是藏族人。来人指指盆里的油条，伸出3根手指头用藏语说：“松，毛子松！”（藏语，松是钱，毛子松是3角钱）

我告诉他我们是汉族人，希望1元钱买5根油条。这人吝啬，最后定价1元钱4根，其中一根还没有小手指头粗。缺乏营养，躺在路边的修华，吃过2根油条才有气睁开眼睛。

我们向他询问，日喀则最便宜的旅店多少钱？10元、6元的都有。对日均

在异乡

## 允大哥

张国勇

个人消费不超过1元钱的我们，这个价格过于昂贵，休养治病不是一两天的事儿。那人以为我们是做成生意的好主顾，凑过来说，便宜的也有！如果到他家住下，1人只收我们4元。

我当然要讨价还价，最后达成协议，每人住宿一天3元。

那人领着我们走到日喀则市中心，帮佳孔市场南边的一个胡同里。所谓的屋子其实是羊圈改成不足10平方米的棚子。这处羊圈改成的棚子四处漏光透风，是他从一个藏族教师那里租来的。经过交谈，这个40多岁的矮个男人叫允海池，是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酒后乡人。他在西藏谋生的方法除了炸油条，主要捡拾破烂换钱。我们叫他允大哥。

一张破旧的板床占据半个屋子，病重的修华睡在床上，我与允大哥打地铺，睡在泥土和羊粪混杂的地上。

我相信，允大哥留下我们的目的是赚住宿费，尽管一天6块钱，但对于他毕竟是一笔收入。羊圈无灶不能烧柴，炸油条用电。日喀则电能紧张，深夜2点后才来电。允大哥摸黑称面、配咸、发面，面醒了段时间，就

把裸露的电线搭在窗外另一条电线上，在电饭锅里炸油条。

油条一根一根炸出来，油烟弥漫了整个屋子，睁不开眼，屋里呆不下去，我干咳着跑到外面换空气，天天如此。

经过几天相处，没有文化的允大哥对我们另眼看待。先前他以为我们是找生活的盲流。后来见我写日记，能画还算漂亮的钢笔画，一改先前指使我们干活的派头，见我们干活儿，抢下活儿不让我们干。

修华养病期间，不舍得花钱的允大哥，每天都要买些鱼和肉回来给修华补身子。西藏人不吃鱼，鱼便宜，鱼在冷水里长成，没鳞没鲜味儿。

为了减轻允大哥负担，我经常端着一盆油条去扎什伦布寺前面的市场卖。油条主要是卖给打工的汉族人。路上看到别人丢弃的酒瓶、易拉罐，我也会捡回来码在住处外面。

经过4天调养，修华的病开始好转。考虑到未来的漫漫长途，我们私下合计过雅鲁藏布江，去神山冈仁波齐，再去阿里。

临走时，我拿出30元钱，说，大哥，这是讲好的住宿费。大哥低头蹲在

地上抽闷烟儿，一言不发，我再让他收下，他整个愤怒了：“钱，什么钱？大哥虽然是出来挣钱的，但这钱，我要挣，还是你大哥吗？”

那一夜，我与允大哥唠了一宿，允大哥讲河南农村的媳妇和读书的孩子，他远走西藏打工，就是为了供孩子读书。临走，他掏出50元钱塞到修华手里，说：“后藏，人烟少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，有钱总比没钱好，你们拿这钱，让大哥踏实……”

允大哥双手搂着我俩的肩膀泪流满面，“你们是做大事的人，不要像大哥一辈子混不出人样儿。等我老了，兴许讨饭到你们家门前，给我口水喝就行！”



张国勇，1964年生于辽宁抚顺。旅行作家、《抚顺日报》记者。1990—1993年，连续徒步环国旅行一千余天，首次实现中国人徒步跨越中国大陆版图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端点。

2012年7月，我领到大学毕业证，因感念于国家以各类助学金、奖学金形式助我安然度过四年大学，便毅然报名参加了由团中央、教育部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。凭着省“双优生”的条件，我很快便通过资格审查，名单业已公布，不料却在体检环节出了岔子，最终被意外派到了黄山市黄山区团委。

一心想去新疆没去成，且服务地也不在所谓的“最基层”，心里颇为失落。在接我的车上，我始终低着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接应人。天慢慢地黑了，我们在一处半山腰上停了下来，吃农家晚餐。真正让我回神的，是端上桌的一盘“红太阳”。

红太阳，是当地人的叫法，其实不过是辣椒粉饼，看上去就像一轮火红的太阳。这道菜，我家乡也有，多在冬日里食用，将剁碎的红辣椒和着盐、蒜蓉、米粉浸在陶缸里，名曰“辣椒糟”，吃时舀出煎成圆饼切块，名曰“辣椒渣”。外婆很会做，煎熟的辣椒渣明晃晃，又香又嫩，每年寒假一到，我和弟弟就会争抢着去外婆家吃她做的辣椒渣，那是乡下极可口的下饭菜。自外婆去世后，我已数年没吃过，竟在黄山吃到了，虽味道略有差别，却足以让我与此地亲近几分。

可喜的是，单位食堂也有这道菜。很快我又知道，那里人喜欢晒笋干、梅干菜、萝卜丝、蕨菜等干菜，在炒各种菜时都喜欢放一把辣椒。家家户户的门前有纤藤缠绕的药扁豆，

## 夜半惊魂

毕瑾

屋檐下吊着菜瓜，田埂地头的黄豆挨挨挤挤，路边的地埂上黄橙橙的南瓜卧伏着，一副敦实、憨厚的样子……环境、吃食上确实有太多相似，唯有一样让我不能理解——当地人早餐极好面食，街头却少有包子、馒头铺。

每天早上，我看着一拨拨人涌进面馆。看了半个月后，我也走进了住所附近的那家名曰“太平面条”的面馆。五元钱。老板端上来一只大碗，手工面，油重辣重，蓬起来的面条上实打实地铺了厚厚一堆瘦肉丝、豆干、笋干。肯定吃不完，我心里想着。随手挑起面条就往嘴里送——汤汁竟如此鲜美，尤其那笋干，清香浓郁，也有嚼劲，味蕾顿时大开，几分钟，我便将一碗面条吃得连汤都不剩。

此后，我竟着了魔似的隔三五就想来一碗。那一年，我吃的“太平面条”估计是此前二十多年中的数倍有余。

我身边好几个外地朋友同样如此。他们和我一样，从江西、湖南、云南等地来到山区，大多是考入当地的基层公务员。我素来对三个字的人名叫不顺口，图方便，便擅自给他们统一安排了“雅号”：来来、玥玥、球球、苗苗、斌斌、芳芳、俊俊、州州、晓晓、岑岑……所幸，他们都不计较，叫着叫着竟像亲友一般，一有空我们便三五成群，聚在一起。

聚会很简单，轮着买菜，轮着烧饭，轮着洗刷碗筷，经常是萝卜白菜土豆连同猪肉一锅煮，我们围着热气蒸腾的电磁炉，你一筷子我一勺，直到汤尽菜绝才肯抹嘴。饭罢，来一牌“天黑请闭眼”或是“狼人杀”游戏。秋冬季节，若是天气晴好，我们便骑着摩托车，扛着铁锅铁铲来到大河石滩上，垒起灶灶，捡来河床上的枯枝败叶，蹲在河边，一边削着土豆一边细数着那清亮亮河面上的一席碎银。春夏时日更好，相邀爬后山，坐船去太平湖岛上看猴子，去俊俊的农家乐店里义务当上菜员、采摘太平猴魁，顺便吃一顿鲜鱼。我们还坚持每周登山健身，集体买各种公考书、考研书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，静静看书做题。那一年，我和另外两个朋友进了研究生复试，有两个朋友考到了更好的单位，还有人考回了自己的家乡结束了漫长的异地恋。现在想来，那段日子真的励志，也清亮亮的。

从茫然到心安，从举目无亲到好友满地，原本有意留在当地的我，却突然被一个噩梦断了念头。

其时单位安排我住在一个三层还建房的顶楼，一楼住的是一位聋哑白发的老奶奶，喜欢笑，常常伸手要东西，二楼住的是一个约摸四五十岁的精神不太正常的单身壮汉，尤爱唱红歌，嗓门又大，早晨四五点开唱，经

常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上下班时，会遇到他们，只是礼节性地打打招呼，一直相安无事。不料几个月后，二楼壮汉竟开始莫名其妙的叫喊，我起先也没太在意。直到有一天半夜，壮汉蹭蹭跑上楼，一个劲地踹我的门，边踹边喊开门，也不说事，气势汹汹。从梦中惊坐起的我，看着窗外一团黑，一顿惊慌，不敢开灯不敢回应不敢打电话甚至不敢喘气，心直接蹦到了嗓子眼。发短信给最近的朋友，太晚，没人回。从窗户爬下去，太高，没垫脚。憋着气的我颤巍巍拉起被子盖住全身，哆嗦着拿起手机，压低音量拨通了“110”电话……漫长的等待中，警察终于带走了壮汉。

此后，我再也没见到壮汉，一年服务期刚满之日，我果断选择了离开。

我逃离了那个地方，与这个壮汉显然有关系。后来，我又来到了现在的城市，相对于我的家乡来说，它还是异乡。



毕瑾，1990年生于太湖县，现居安庆。本报副刊编辑。

在异乡